

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:舒语佳.乾隆五十三年荆州水灾淹毙人口和政府救助措施考辨[J].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4,47(3):54-58.

乾隆五十三年荆州水灾淹毙人口和政府救助措施考辨

舒语佳

(湖北大学 文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62)

摘要: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荆州遭受特大洪水侵袭,府城被淹月余。关于大水淹毙人数,文献中存在两种说法,一为地方官员奏报的一千七百余名,二为乾隆认定的不下万余名。将荆州满汉两城及江陵县狱囚的死亡人数和比例进行考辨和对比,可以发现乾隆所说并无根据,湖北地方官员并未瞒报淹毙人数。灾后,湖北地方官员有条不紊地完成临灾急赈、正赈、展赈、工赈等事宜,并非如乾隆所斥责的那样不堪。在湖北活埋、冒赈等案相继败露的背景下,乾隆对湖北地方政府产生了严重信任危机,先入为主地断定此次水灾存在瞒报及救济不力情况,忽视了湖北地方官员所作贡献。

关键词:荆州;水灾;淹毙人口;救灾措施

分类号:K248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24)03-0054-05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荆州城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袭击,大水冲溃荆州万城堤^①堤身 20 余处。万城堤从中方城开始溃决,该处距江甚近,以致大水漫过各洲,与沙河连成一片,从而冲溃堤身,破城而入。此次大水是荆州继乾隆四十四年(1779)、四十六年(1781)江汉大水后,十年中第三次水灾,灾情异常严峻。乾隆皇帝接到灾情奏报后高度重视,派遣钦差大臣阿桂前往荆州勘察,并于一个月内连发 14 道谕旨加急抵传荆州。钦差大臣与湖北地方官员对水灾善后处理的奏报亦持续一年之久。

这些谕旨和奏折不仅有助于还原荆州水灾过程,亦有助于了解乾隆对湖北吏治的态度。在接到荆州灾情奏报后,乾隆第一反应是认为湖北地方官员所奏报的淹毙一千七百余名^②是在讳饰灾情,瞒报了死亡人数,他认为水灾淹毙人数必定“不下万余”^{[1](P636)}。这体现出乾隆对湖北地方官员的不信任。

乾隆对湖北地方官员的不信任态度,对后续水灾原因的认定、灾后官员的处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在乾隆对湖北地方官员信任极度缺失的背景下,大水淹毙人数是否如其所认定“不下万余”,水灾中湖北官员的表现是否如其所斥责的那样不堪,均值得进一步探讨。水灾淹毙人数是衡量灾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,而此次水灾的淹毙人数尚存争议。目前学界对于该次水灾淹毙人数缺乏深入考证,一般直接采信乾隆皇帝“不下万余”的说法,并将其作为湖北吏治废弛、官员瞒报灾情的佐证。本文从亲历该次大水官员的奏折、乾隆皇帝谕旨及地方志等史料出发,探讨乾隆五十三年(1788)大水淹毙人数究竟是湖北地方官员奏报的一千七百余名,还是乾隆皇帝认定的“不下万余”,分析湖北地方官员是否讳饰灾情,继而讨论灾民所受救济措施的及时性和充分性,探究湖北地方政府救灾的执行状况。

收稿日期:2023-11-05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清末民初长江水利文献与长江流域洪水综合治理研究”(23BTQ032)

作者简介:舒语佳(1995-),女,湖北武汉人,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。

① 荆州堤垸,自得胜台至玉路口一带,总名万城堤。

② 湖广总督舒常奏称,荆州汉城及城外淹毙人口为一千三百六十余名,荆州驻防将军图桑阿奏称荆州满城淹毙人口为四百余名,总计约一千七百余名。

一、水灾淹毙人数的两种不同记载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六月,岷江、沱江和涪江地区连降暴雨,川水汇入长江后,与三峡区间和中游地区洪水相遇,造成罕见洪灾。自 6 月 19 日始,荆江两岸连日暴雨如注,水势急剧上涨。6 月 20 日,荆江大堤溃决,江水直逼城下,西北两门均被冲开,城墙多有冲缺,满汉两城的文武衙署、兵民房屋及仓库、监狱等俱被淹没,城内水高至“一丈七八尺不等”^{[2](P772)}。城中赴城墙、屋顶等高阜地区躲避洪水的官兵及百姓共计“三万余人”^{[2](P773)},其中奔走不及者多被淹毙。据地方官员查明,荆州城内外淹毙百姓共“一千三百六十三名”,坍塌瓦草房屋共“四万零八百一十五间”^{[2](P773)}。

乾隆四十四年(1779)、四十六年(1781),荆州城也曾遭到大水袭击,不过前者仅溃“沙市外堤、观音塔”两处,后者溃“沙市古月堤、蓝家垵”等四处^{[2](P816)},两次水灾“虽曾被冲水,头不过数尺,并未入城”^{[3](P247)}。而乾隆五十三年(1788)大水,堤身溃决多达 20 余处,“水高一丈数尺,波涛汹涌,来势甚骤”^{[3](P247)},致荆州城破,淹毙众多兵民。

荆州府城分为满、汉两城,东为满营,西属汉城,中间仅立有一道界墙。据舒常奏折记载:荆州府城西门、北门、小北门、东门四处城楼均被冲塌,各处城墙共塌陷 20 余处,塌陷处宽数丈至二三十丈不等,除城墙塌陷之处外,其余位置也因积水膨胀裂开。^{[2](P774)}

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在崔龙见等人重修的《江陵县志》中,记载了此次水灾情况:

乾隆戊申六月二十日,堤自万城至玉路口决二十余处,水冲西门、水津门两路入城,官廨民房倾圮殆尽,仓库积储漂流一空。水积丈余,两月方退,兵民淹毙万余,号泣之声晓夜不辍,登城全活者露处多日,艰苦万状,下乡一带田禾尽被淹没,诚千古奇灾也。^{[4](P169)}

据湖北地方官员奏报,荆州此次大水淹毙总人数为一千七百余人,死亡人口分布于满城、汉城及城外各乡三区域。关于满城淹毙人数记载如下:“据图桑阿查奏,满城淹毙者,共四百余名。”^{[1](P636)}满城为清代驻防各地的满洲八旗官兵划定与修筑的城区,实为大军营,故常被称为满营。^{[5](P794)}经荆州驻防将军图桑阿查明,荆州满城淹毙人口为四百余名。关于汉城及城外各乡淹毙人数记载如下:“城廂内外,淹毙大小男妇人口,经舒常等查明,共有一千三百六

十余名。此等民人,因躲避不及,仓促淹毙,实堪怜悯。”^{[1](P633)}舒常奏称,荆州汉城及城外各乡淹毙人口为一千三百六十余名。淹毙人口被称为“民人”,这说明舒常奏报中的淹毙人口仅包括汉城及城外各乡百姓,不包括满城。故荆州满汉两城及城外各乡淹毙人口总数为一千七百余名。

另据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七月初十日舒常奏称:“各乡被水之时,来势不为甚急,居民先已搬赴高阜处所及堤埂躲避,淹毙人口尚少,惟房屋坍塌甚多,现虽委员分路确查,但恐水未全涸,一时不能得其实数。”^{[2](P773)}从舒常奏报可知,荆州府城外及周边县市灾情相对较轻,一方面至城外时,水势已经减缓,不如城内湍急;另一方面城外居民可至高阜处躲避,从而淹毙人数较少。因此,此次大水淹毙人口应集中于荆州府城内。

舒常在奏折中还提到:“被水之初,居民多赴城上躲避,共有三万余人……近日或渡赴沙市,或仍回涸出原屋,现在城上搭棚居住者尚有一万余人,城廂内外被水乏食贫民共二万余户,应照例抚恤一月口粮。”^{[2](P772~773)}由此可知,荆州城内外灾民共二万余户,参考葛剑雄等人对于清代“正常和合理的户均口数应该为 5”^{[6](P70)}的分析,灾民人数约为十万。

然而,乾隆皇帝并不相信湖北地方官员对于水灾死亡人数的奏报,而是斥责湖北吏治废弛,认为舒常讳匿淹毙人数,此次淹毙人口应该超过万数,“湖北吏治亦属废弛已极……外省官员于灾伤向有讳饰,兹报出者已有一千三百余名之多,则其讳匿不报者,必尚不止此数,想来不下万余”^{[1](P636)}。水灾发生后,乾隆派遣钦差大臣阿桂前往荆州勘办灾后各项事宜,并严厉处罚湖北大小官员 20 余人,处罚范围甚广。乾隆五十九年(1794)重修的《江陵县志》及之后的《荆州府志》等史籍均采信乾隆皇帝提出的大水淹毙兵民万余人的说法,“……兵民淹毙万余,号泣之声晓夜不辍,登城全活者露处多日,艰苦万状,下乡一带田禾尽被淹没,诚千古奇灾也”^{[4](P169)}。

关于此次水灾淹毙人数,文献中存有湖北官员奏报一千七百余名与乾隆皇帝认定“不下万余”两种不同记载,目前大部分学者采信后者,并将其作为湖北吏治废弛、官员瞒报灾情的佐证。但是,笔者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疏理,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

二、水灾淹毙人数考辨

死亡人数是衡量灾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。乾隆认定的淹毙人数不下万余与湖北地方官员奏报的

一千七百余名相差甚大,若此次荆州水灾淹毙人数高达万余,则说明荆州堤防建设、地方官员平时对灾情的防范均出现极大疏漏,乾隆对湖北官员的斥责与处罚无可厚非。然而,如果湖北地方官员并未瞒报淹毙人数,则说明乾隆对湖北官场吏治废弛有先入为主之嫌,处罚过重。下文将通过对比满汉两城死亡人数及比例、囚犯死亡人数及比例等数据,对此次水灾的真实淹毙人口进行探讨,用实际数据破除乾隆五十三年(1788)水灾淹毙人数错误说法的流传,以此证明湖北地方官员并未瞒报水灾淹毙人数。

(一)荆州满城淹毙人数及其比例考辨

为避免驻防将军拥兵自重,清政府对其权利进行了一定限制,只允许其管理满城内事务,原则上无权干预地方事务。此外,政府还建立了驻防将军与地方官员相互监督的制度。乾隆四十一年(1776),在设立成都将军的谕旨中提到:“若日后将军或因事权专重,擅作威福,扰及地方,干与民事者,总督原可据实陈奏。又或总督轻听属员之言,于番地情形,动多牵掣,致误公事者,将军亦当据实奏闻。”^{[7](P468)}可见当时驻防将军与当地官员之间是互相牵制的关系。

虽然驻防将军不对地方事务负责,却负有监督地方官员的义务。荆江大堤决口、荆州府城被淹属地方事务,但却在荆州驻防将军图桑阿的监督范围内,图桑阿没有替地方官员瞒报的理由。此次水灾查处官员众多,上至湖广总督,下至荆州道府、知县、县丞,大小地方官员达 20 余人,并未涉及荆州驻防将领。故驻防将军图桑阿无需对本次水灾及善后工作负责,其所奏报“荆州满城淹毙者,共四百余名”应为可信数据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荆州驻防设立之初,满蒙八旗兵丁及家眷共计 15000 余人,期间驻防兵丁多次被分拨至成都、杭州等地。至光绪五年(1879),荆州驻防仍有“五千六百七十余户,二万二千九百余名”^{[8](P131)}。荆州驻防八旗人数逐年增加,未能悉载,暂无乾隆年间相关人数记载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恰处康熙二十二年(1683)与光绪五年(1879)中间,在此取康熙二十二年(1683)与光绪五年(1879)荆州驻防八旗人数的平均值作为估计,则乾隆五十三年(1788)荆州驻防八旗总人数约为 18000 余名。据驻防将军奏报,满城淹毙人数为 400 余名,可知满城淹毙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为 2.22%。

(二)荆州汉城淹毙人数及其比例考辨

清代人口估算大都以《嘉庆一统志》中数据为衡

准,但其中荆州府人口数据存有较大讹误。葛剑雄等人将嘉庆二十五年(1820)与 1953 年荆州府人口数据对比修正后发现,嘉庆二十五年(1820)荆州府人口约为 191.4 万,而《嘉庆一统志》记载的为 415.6 万,二者相差 224.2 万^{[6](P162)},误差相当惊人。因此,不宜将其作为乾隆五十三年(1788)荆州府城人口的估计标准。

经葛剑雄等人分析^{[6](P825~827)},清代末年荆州府城人数为近 5 万人。他们还估算,清代末年湖北城市人口总数为 172 万,较乾隆四十一年(1776)增加约 60 万,且增加人口主要来自省城,地方城市人口无大幅增加。据此,乾隆五十三年(1788)荆州府城人口总数应与清末时期基本相当,为 5 万人左右。

如果乾隆五十三年(1788)荆州府城人数为 5 万人,除去满城 1.8 万人,则汉城人口为 3.2 万。若以舒常所奏报的汉城淹毙人数 1363 人计,则汉城淹毙人口比例为 4.3%,约为满城淹毙人口比例 2.2% 的两倍,这与汉城受灾更为严重的事实相符。前文提到荆州满城驻防将军无瞒报灾情之理由,若按“兵民淹毙万余”的说法,则汉城淹毙人口比例超过 30%,为满城淹毙人口比例的 13 倍之多。虽汉城比满城受灾严重,但满汉两城仅一墙之隔,相差不至如此之大。故“兵民淹毙万余”说法存疑。

(三)狱囚淹毙人数及其比例考辨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水灾真实淹毙人数,除可通过对比满汉两城淹毙人数及比例进行考证外,亦可将江陵县监狱囚犯淹毙比例作为佐证。由于江陵县监狱典史工作懈怠,擅自松放狱囚刑具,导致狱内囚犯被水冲走,是溺毙或是趁乱逃跑均无从稽查。舒常奏折和《清实录》中载有江陵县监犯逃逸及拏获情况,包括监犯总数、陆续投案及拏获人数,从中可大致推断囚犯淹毙人数及比例。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七月初十日:

江陵县监内共禁内外结人犯八十八名,被冲之后先经查获三十八名,续又查获六名,尚有四十四名无著。^{[2](P774)}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七月十八日:

现在未获四十四名内,有拟定绞罪一十五名,军流徒犯六名,余系外属解审及本县未结之犯。^{[2](P866)}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九月十六日:

江陵县被水冲散监犯共八十八名,当经查获四十名,又自行投到四名,先后续获五名,又续行投到绞犯黄绍南一名,尚未获三十八名内,

问拟绞罪十一名，军流徒犯三名，余系外属解审及本县未结之犯。^{[3]（P512）}
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十月：

江陵被水距今业已两年，未获人犯，尚有十三名之多，可见该督等，督缉不勤。^{[1]（P1172）}

从上述史料可知，荆州被水时，江陵县监内共有囚犯 88 名，两年后尚有未拏获囚犯 13 名。乾隆于灾后一年规定，在逃囚犯被拏获后，应加重惩治。尚未拏获的囚犯，以绞罪犯和军流徒犯等重罪居多，被加罪惩治后处罚会极重，几乎没有主动投案的可能，被拿获难度甚大。乾隆斥责湖北官员未拿获囚犯“尚有十三名之多”，可见“督缉不勤”，他认为未拿获囚犯在逃者多，淹毙者少。假设未拿获的 13 名监犯全部淹毙，则淹毙人数与总人数比例约为 14.8%，如未拏获囚犯大半逃逸而非淹毙，江陵县囚犯淹毙比例应在 7% 以下。若采信“淹毙人数万余”说法，按照荆州城总人口数为 5 万计，则荆州城淹毙人数比例约为 20%，远高于荆州满城死亡比例与狱囚死亡比例。故“兵民淹毙万余”的说法可信度不高。

因此，舒常奏报淹毙“一千三百六十三名”的数据是可信的。虽因城内积水迟迟未能退去，无法统计确切人数，所报人数可能会有些许误差，但并非乾隆臆断的湖北地方官员讳匿不报者不下万余。乾隆朝所修《江陵县志》想必也是根据乾隆皇帝谕旨编撰，以致“兵民淹毙万余”的讹误传播至今。

三、水灾的原因及地方政府的救灾措施

在湖北活埋、冒赈、盐务私设匪费等案相继败露的背景下，乾隆认为湖北吏治极度废弛，对湖北官员产生了严重信任危机，自然不相信其所奏报的“一千三百六十三名”的淹毙人口数据，认为湖北地方官员讳饰淹毙人数，瞒报灾情。由于乾隆对湖北地方官员善灾能力的不信任，“恐舒常、姜晟等见识未能周到”^{[2]（P791）}，继而派遣钦差大臣阿桂前往荆州勘办灾后各项事宜。

在阿桂与舒常关于水灾原因的争论中，乾隆亦是采信阿桂而非舒常的主张。乾隆认为本次水灾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一是荆江堤工不稳固，难以抵御江水，“此皆从前承修堤塍各员，见该工例应民修，任意草率偷减，侵肥入己。该管上司，复不以事为事，以

致工程不固，一经江水涨发，不足抵御”^{[1]（P635）}；二是地方官员腐败失察，致窖金洲扩大阻碍江水，“奸民见江中涨出洲地，垦种可以获利……地方官因受其贿求，遂罔顾利害，代为朦混”^{[1]（P693）}。这两项原因均可归咎于地方官员渎职。

因此，乾隆将十年内承修过万城大堤堤工的官员，上至湖广总督，下至荆州道府、知县、县丞等 20 余人，根据责任大小，分别给予革职、革职留用、降级和罚款等处罚，“以十年为限，所有现决之堤工，如在十年以内兴修者，承修之员，俱当从重治罪，仍著落赔补，其监修之该管道府，及藩司、督抚等，亦著一并查参，分别议罪著赔”^{[1]（P632）}。

实际上，本次水灾主要原因是水势太盛。舒常、陈准多次提到江水漫过堤面，阿桂也承认“本年盛涨，平漫过堤”^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力难施，水灾与堤工不固、窖金洲扩大致使江流北趋并无直接关系。后世颇具治水经验的嘉道名臣陶澍也认为，此次大水荆州受灾惨重与窖金洲并没有直接关系，而是因水势太大，漫过荆州府城，积水无法宣泄所致：“乾隆五十余年间荆州大水坏城，漂没无算，议者归罪于窖金洲民，谓其种柳洲上所致，其时水已漫城，两堤无泄，九十九洲皆在波底，虽无窖金一洲恐亦难免决溃。”^②

可见，乾隆皇帝将水灾原因归咎于湖北地方官员渎职与事实并不相符，处罚过于严厉。湖北地方官员对于灾情并无重大瞒报现象，他们在大水来临时和水灾发生后也采取了积极的救助措施，乾隆皇帝所斥责的吏治废弛，也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。大水来临时，湖北布政使陈准抵至荆州府城，率地方文武官员将“各城门下闸堵闭，分段照料”^{[2]（P645）}。与陈准同在城中抵御洪水的沔阳州州同姜业耀“因派在西门督夫闭闸，于二十日晚被冲无踪，飭县打捞未获”^{[2]（P646）}，因公殉职。

首先，第一时间开放粮仓，救济荆州府城灾民。荆州府城被水后，数万兵民赴城上搭棚栖止，等待接济。受灾第二日，在查明江陵县仓全部浸水，米谷难以动用后，陈准主动开放用作荆州满营月粮的府仓救济灾民。经陈准查验，府仓粮食虽已有浸湿，但尚堪充腹，于是“将此项米石飭县按大小丁口散给，以作抚恤”^{[2]（P645）}。对于八旗官兵，陈准也有所考虑，认为其“此次被水人口多有损伤，家产荡然，又无亲

① 那彦成：《阿文成公年谱》卷 33，嘉庆十九年刻本，第 35 页。

② 陶澍：《陶文毅公全集》卷 32，道光二十年刻本，第 6 页。

戚可以告贷,较之土著民人尤为拮据”,于是“借给一月口粮”^{[2](P645)}以资接济。与此比照,明代官员擅自开仓急赈会影响其考核、黜陟,“只有少数视民如伤的官员愿意冒着很大风险擅自开仓赈灾”^{[9](P104)}。至清朝乾隆年间,赈济标准得以统一,地方官员能及时对灾民进行救济。

其次,赴荆州城外受灾各处监督发放粮食。荆州城外田庐多被淹损,舒常令官员携带钱米干粮,坐船分赴各处,清查搭棚栖息的灾民数量,散给食物接济灾民,并将灾民数量和散给食物数量立册登记。对于先前已在城墙上领粮者,扣除其已领部分,以免重复。舒常还派遣官员登记各地区被灾轻重等级,为后续分级赈灾提供依据,一切抚恤银两均责令道府随时核实稽查。毕沅继任湖广总督后,为避免吏胥暗中侵扣,下令“将应领银米各数遍行出示晓谕,俾小民自知确实数目,以杜吏胥、地保暗中侵扣之端”^{[10](P762)}。

再次,清点存粮,确保粮食充足。荆州被水后,荆州府存贮满营月粮的仓廩及江陵县常平仓多被冲塌。据舒常奏报,府县已于 6 月 24 日开仓捞米,米谷虽已浸湿,不过尚可充食,南米共有“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余石”^{[2](P774)}。江陵县常平仓贮有米谷“一万余石”^{[2](P818)},灾后舒常下令将米谷存放至高阜处,使其不致被水淹湿发霉。地方官员不仅尽力抢救本地粮食,还考虑从他县采购粮食。“沙市一带系川米聚集之处,现闻荆郡被水,上下米船源源而至,日来中下米石价银一两五六钱甚属平减。”^{[2](P773)}此外,舒常先后两次从司库提取库银共 4 万两,如粮食不足,这 4 万两可购米 2 万石以上。按照府城内外乏食贫民共 2 万余户,假设每户大口 4 人、小口 1 人,需接济灾民为 10 万人,参考乾隆四年(1739)制定的赈济标准:大口日给米五合,小口二合五勺,则 10 万人一月口粮约为 13500 石。可见,荆州粮食足以接济灾民。

正赈毕后,灾民的基本生活短期内虽得以保障,但无法长时间维持,因此地方官员奏请采取加赈、展赈措施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十一月,毕沅奏请将“各州县初赈银两按数于十月内一律散给以后按分加赈”^{[10](P203)}。乾隆五十四年(1789)三月,陈淮奉旨将“江陵、监利二县分别展赈两月”^{[11](P479)}。

大水后,荆江堤塍和荆州城墙等修复工程均亟需兴办。政府招募灾民进行劳作,按日给米或钱,此法既可使灾民免除饥馑,又能有效利用民力。此次荆州水灾,乾隆拨给工赈的费用,“除现需银一百万

两之外,再酌留五十万两在彼预备应用”^{[3](P645)},较为宽裕。在朝廷拨付大量款项用于工赈的同时,湖北地方官员亦采取各种措施实施工赈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八月十六日,毕沅奏报灾民“于市鄺之内就近佣工,各谋生计”,并从即日起“修筑城堤各工,并举无业贫民咸得赴工力作”^{[3](P247)}。至十一月,四乡穷民俱已糊口有资。

荆州被水后,百姓生活困难,亟待接济。得益于湖北地方官员采取的各项临灾急赈措施,荆州府城内外损失得以降低,灾民生活也得到了保障。此次大水后,湖北地方官员不仅未隐瞒淹毙人数,还积极救助灾民,及时保障了数万兵民生活之需,这与灾后乾隆所斥责的湖北地方吏治废弛不符。

四、结语

在乾隆五十三年(1788)荆州水灾之前,湖北曾相继发生活埋、冒赈、盐务私设匣费等吏治腐败事件,这导致乾隆丧失了对湖北地方官员的信任,本次水灾成为其整顿湖北吏治的契机。因此,水灾一经发生,乾隆即认定湖北地方官员存在讳饰灾情的情况。在清代“人治”背景下,皇帝的情感取向对事件的定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此次水灾后,乾隆的主观判断影响了清廷对水灾原因的认定和对湖北官场的处置,这些记载进而影响了后世对该次事件的研究。我们需持实事求是的态度,借助文献资料,探求历史事件的原本面貌,不能因湖北官场曾出现过吏治腐败现象,就断定此次水灾存在瞒报及救济不力情况,忽视湖北地方官员所作的贡献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清高宗实录(第 25 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2]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.宫中档乾隆朝奏折(第 68 辑)[M].台北:台北故宫博物院,1987.
- [3]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.宫中档乾隆朝奏折(第 69 辑)[M].台北:台北故宫博物院,1988.
- [4]崔龙见,等.江陵县志[M].武汉:崇文书局,2020.
- [5]孙文良.满族大辞典[M].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0.
- [6]葛剑雄.中国人口史(第 5 卷)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5.
- [7]清高宗实录(第 21 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8]倪文蔚,等.光绪荆州府志[A].中国地方志集成·湖北府县志辑(第 36 册)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1.
- [9]鞠明库.灾害与明代政治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.
- [10]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.宫中档乾隆朝奏折(第 70 辑)[M].台北:台北故宫博物院,1988.
- [11]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.宫中档乾隆朝奏折(第 71 辑)[M].台北:台北故宫博物院,1988.

责任编辑 刘春丽 E-mail:157476703@qq.com